

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黛尔的性别述行

祝明媛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

摘要: 爱丽丝·门罗 2013 年获诺奖催生了“门罗热”, 但其自传性质作品《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却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通过聚焦作品女主人公黛尔的性别身份形成过程, 剖析各类权力话语主体如何通过重复引用性别规范建构黛尔的性别身份, 探究黛尔在面临性别述行时如何质疑性别规范、颠覆性别述行, 揭示出黛尔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及其主体性建构过程, 阐明门罗如何打破西方男女二元对立与固定的性别范畴, 彰显其性别身份流动性的性别观念。

关键词: 爱丽丝·门罗;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黛尔; 性别述行

DOI: 10. 64216/3080-1516. 26. 01. 082

爱丽丝·门罗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加拿大女性作家之一, 其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描述了女主人公黛尔·乔登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加拿大小镇弗莱兹路的成长历程, 探寻了女性身份、母女关系等主题。小说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加拿大书商协会国际读书年奖, 也因其自传色彩成为研究门罗创作背景的重要作品。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主义视域。耿力平不仅阐明了第一人称叙事策略对揭示作品女性主义主题的重要作用^[2], 还阐释了门罗的辩证女性观^[3]。刘意清和李洪辉揭示了门罗对传统性别局限的超越^[4], 吕晓菲探究了门罗对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的反思^[5]。

现有研究对黛尔性别身份建构的专门探究仍然较欠缺。后女性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性别述行理论, 将性别定义为“对身体不断地予以风格/程式化, 是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管控框架里不断重复的一套行为, 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固化, 产生了实在以及某种自然的存有的表象”^{[6]100}, 以此否定性别的纯自然特性, 认为性别是通过行为的不断重复而述行的社会角色。在作品中, 各类权力话语主体通过反复引用社会规范参与黛尔的性别建构, 黛尔为探寻性别身份的抗争导致了性别述行的失败。通过将《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置于性别述行理论的视域下, 探究黛尔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述行及其身份建构。

1 黛尔的性别述行

1.1 通过召唤参与性别述行

巴特勒指出, 询唤可以将婴儿从“它”转变为“她”或“他”, 女孩由此“被女孩化”, ^[7]命名过程由此对

主体具有述行作用。作品中, 玛德琳身体的隐形并未让她逃离言语召唤的命运。她在班尼叔叔的信中被赋予男权社会渴望的女性形象, 作为“某女”和“单身母亲”存在。在婚后, 她的身份立刻变成了普尔太太, 如班尼叔叔所言, “不是豪威小姐, 是普尔太太了”^{[8]18}。玛德琳从未拥有独立的身份, 而是通过其男性身份的不在场来反映其身份。由于玛德琳种种看似疯狂的行为, 班尼叔叔将她称为“疯女人”, 小镇上的人将其称为“悍妇”、“野猫”, 黛尔的父亲将她评价为“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过日子的人”^{[8]24}。玛德琳身体的缺席并未阻止她被建构为各类女性性别角色的命运, 男性通过引用性别规范, 将女性定义为贤惠顺从的“屋中的天使”形象, 当玛德琳未能满足该要求时, 她便变成了“悍妇”般的“阁楼上的疯女人”, 这些言语述行凸显了男性将社会规范强制施加给女性, 从而参与性别规范制定的权力运作机制。

1.2 权力话语主体参与性别述行

巴特勒指出, “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践, 通过操演生产而且强制形成的”^{[6]83}。在管控性实践过程中, 各类权力话语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推动二元性别关系生产和性别等级的建构。各类权力话语主体都参与了黛尔的性别身份建构, 企图对她进行性别规训。黛尔父亲和班尼叔叔对女性的价值进行了无情地批判, 声称“有一个那样的女人在身边应该是很方便的”、“问题是要娶个胖的好还是瘦的好啊? 胖的一定会做饭, 但是可能会吃的很多。不过特别瘦的也有能吃的, 很难说。”^{[8]13}。他们的谈话物化了女性, 将女性看作交易的商品, 这反映了男性作为权利主体对女性的压迫与剥削。面对该言论, 黛尔母亲艾迪指出, “你好像

是在买奶牛”^{[8]13}，揭露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在班尼叔叔与玛德琳的婚姻中，玛德琳更是成为了班尼叔叔与玛德琳哥哥之间的交易品，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女性在婚姻中没有身份，只是一个关系条件，确保姓氏的再生产以及男性宗族间象征性的结合。

1.3 制度性话语参与黛尔性别述行

巴特勒指出：“性别化意味着臣服于一整套社会规则，让指导着那些规则的律法不止成为一个人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快感与欲望的形成原则，同时也成为诠释自我的解释学原则。”^{[6]212-213}。报纸等作为制度性话语的产物，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黛尔的性别意识建构，强化传统的性别范畴。报刊杂志里充斥着攻击女性的内容，“把孪生女孩喂给猪吃的父亲”、“一妇女生出猴孩”等内容，都将女性置于低劣的位置，向黛尔灌输着女性“他者”的思想，让黛尔无意识地接受性别规范，黛尔由此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规范，被动地认可了女性性别刻板印象，努力按照男性的意志操演性别身份。黛尔在舞会上与男人跳舞时，她努力地附和着，为了挽留舞伴而将自己伪装成他渴望的对象的样子，担心自己一个不及时的表情便会让舞伴离开，在舞曲结束后，黛尔因为自己有一个男人在身边而自豪^{[8]217}。黛尔对舞伴的附和反映了她对男权的屈服，她对性别规范的重复和模仿，以及黛尔在男权社会性别文化规范的压迫下其主体性的丧失。

2 黛尔对性别述行的挑战

2.1 质疑社会权力规范

黛尔通过质疑权力规范挑战了性别述行。黛尔要求上帝回应自己祈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象征着黛尔对西方信仰体系的质疑。为了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黛尔向上帝祈祷周四可以不用去给缝纫机穿线，尽管她最终的确因为缝纫技术太差而侥幸不用穿线，但她质疑上帝在其中的作用。随后，黛尔不断地在弟弟欧文身上、在母亲身上进行实验，但仍然不能找到证明上帝存在的确切证据。在耶稣受难节，尽管黛尔坐在教堂里想象耶稣的痛苦，但她却始终充满质疑，“耶稣的痛苦真的那么沉重吗？”“为什么上帝要憎恨他创造的一切？”“如果他憎恨，为什么要创造？”^{[8]127}最后，黛尔甚至开始讨厌耶稣。黛尔在梅杰的死亡中看到了宗教与生活的冲

突——祈祷并不能阻止梅杰的死亡，因此上帝并不存在。黛尔对上帝这一信仰体系的质疑反映出她对宗教权威及其所代表的权力规范的质疑，她对宗教的否定使其性别意识觉醒具有了启蒙般的色彩，在挑战传统规范的同时，她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开始觉醒。

2.2 通过语言反抗性别规范

黛尔还通过语言作为媒介反抗传统的性别规范，母亲艾迪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艾迪虽然承担了传统性别规范赋予女性的责任，但她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追求。正如黛尔所记叙的，“母亲没有放弃任何事情”^{[8]88}。艾迪对自我的坚持体现在她对写作和知识的痴迷。尽管卖百科全书的路程充满艰辛，但她却从未放弃；她坚持给报纸写信，探讨地方问题、教育和妇女权利、反对学校必修宗教课等男性话题。在艾迪的影响下，黛尔爱上了写作，并开始思考——艾迪最终只能以“我母亲”的身份为结局吗？^{[8]94}黛尔的问题不仅是对女性身份和命运的思考，更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诘问：所有女性的最终命运都仅仅是成为一位母亲吗？这一问题反映出黛尔意识到了女性在传统秩序下天分被剥夺、自我价值被否定的现实处境，展示出巴特勒所描述的女性在男性创立的语言语境里言说的述行矛盾——在语言上确立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却无法在语言里存在，女性无法在男性创立的语言体系里建构自身的性别身份。^{[8]55}

2.3 通过变装挑战性别规范

巴特勒指出，女性能够通过变装对性别述行作出回应，变装作为性别戏仿的途径，能够将性别范畴去自然化，批驳霸权文化关于本质主义性别身份的主张。黛尔在听到意大利父亲卖女儿的故事后，开始了变装表演，她换上母亲的人造丝晨衣，在镜中观察着自己，想象着被买卖的女孩，想象着弗莱兹路尽头的三个妓女，想象着张伯伦先生看见自己裸体时的情景。这一行为与黛尔曾经认为睡衣无法遮挡女性大腿的想法大相径庭。曾经讨厌睡衣的黛尔反映了她在男权社会下对性欲的强烈羞耻感，而如今的黛尔则展现了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后的独立个体形象。此外，黛尔像男孩一样玩毛虫、画裸体女人等行为，体现出她对男性气质的戏仿。据此，反观黛尔始终无法学会缝纫这一事实，是否反映出她对性别分工的拒绝？黛尔拒绝继承克雷格叔叔的手稿，是否体现了她对男性话语的否定？黛尔想要虐待死去的老牛

的欲望,是否暗示了她渴望打破男性权威的意识?黛尔在对男权社会规范提出质疑的过程中,其性别意识也逐渐觉醒。

3 黛尔性别述行的失败及主体性建构

3.1 性别述行的失败

巴特勒指出,女性主义的关键任务是找出颠覆性别规范的策略,通过介入性别规范的建构,发掘挑战这些实践的内在可能性^{[6]299}。黛尔在面对杂志文章对男女不同思维的描述时,直言“我想要男人爱我,同时当我看满月的时候,我渴望想象着宇宙”^{[8]210}。当读到“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问题吗?”等内容时,黛尔坚定了自身的想法:“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个男孩子”^{[8]210}。黛尔的行为及心理反映了性别规训的失败,黛尔不仅否认了性别规范对女性形象的建构,还通过反对性别刻板印象明确了自身的主体地位。此外,在与克里夫接吻时,黛尔觉得他的舌头是抹布;在与他讨论妇女平权时,黛尔感受到了责任感,反对克里夫代表的男性观点;在见到内奥米的父亲时,曾经作为权力象征的男人此刻却让黛尔觉得像一具复活的尸体。在与男性交往的过程中,黛尔逐渐从渴望男性认同的从属地位,变成了否定男性权威、批判质疑男性主体地位的超越地位,这反映出男性权力企图将黛尔述行为男性附庸品的失败。

3.2 黛尔的主体性建构

黛尔真正实现自身性别身份认同是通过她与性的三次尝试所达到的。在目睹张伯伦先生自慰时,黛尔认识到了人类的“脆弱、可笑和幼稚”^{[8]195},这一认识使黛尔打破了对张伯伦先生俄狄浦斯般的依恋与性幻想。在与杰里交往时,黛尔与他进行思想上的争论,感受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弗雷奇试图给黛尔受洗时,黛尔坚定的反抗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弗雷奇所拥有的权力都是自己给予的。这一认识不仅标志着黛尔对女性权力的崭新认识,也让她体会到了女性在面临压迫时的主动地位。此后,黛尔感觉自己“重新拥有了世界”、感觉到了“原来的自我”^{[8]272},这一象征性的时刻标志着黛尔自我意识的觉醒,黛尔由此建构了自身的性别认同与主体性。通过反对性别规范的重复述行,黛尔反抗了传统规范对其身体的规训性生产,实现了对个人身份和主体性的追寻。最终,黛尔成为了一名作家,

找到了“真正的生活”^{[8]273},即可以通过女性书写建构女性话语与主体性的生活。

黛尔作为一名女性,在其成长过程中与弗莱兹镇这个男权社会与二元性别体系缩影的小镇中的各类性别规范进行了不断地互动:一方面,各类权力话语主体通过引用传统的性别规范,企图参与黛尔的性别身份建构;另一方面,黛尔通过语言和变装等手段不断地对性别述行进行挑战,拒绝权利主体对其性别身份建构。最终,在性别述行的过程中,黛尔同时具备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体现了其性别身份的流动性特征,促成了性别述行的失败,黛尔也逐渐明确了自身的主体性,形成了自身的性别身份认同。通过黛尔这一女性角色,门罗探究了女性在性别身份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性别述行,以及女性如何在面临性别述行时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积极建构自身的性别身份。通过黛尔的成长历程,门罗对性别身份的自然性质与社会性质进行了反思,揭示出性别身份并非某种固定不变的或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在社会文化中不断被述行的产物,因此应该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性别身份。

参考文献

- [1] 爱丽丝·门罗,斯蒂劳·阿斯伯格,吴永熹,江楠,柏林. 爱丽丝·门罗:在她自己的文字里[J]. 名作欣赏,2014, (1): 49-53.
- [2] 耿力平. 浅议门罗叙事策略观照的女性观[J]. 当代外国文学,2017, (1): 125-130.
- [3] 耿力平. 试论门罗小说的辩证女性观[J]. 外国文学,2018, (1): 13-24.
- [4] 刘意清,李洪辉. 超越性别壁垒的女性叙事:读芒罗的《弗莱茨路》[J]. 外国文学,2011, (4): 3-10.
- [5] 吕晓菲.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 外国语文,2014, (30): 7-12.
- [6] 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宋素凤,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7] 李庆本. 朱迪斯·巴特勒的后女性主义理论[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8): 61-82.
- [8] 门罗.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M]. 马勇波、杨于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祝明媛(2003.02—),女,汉族,四川广安. 硕士研究生,研究英美文学。